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從索緒爾語言學和維根斯坦後期哲學看政治學方法論的「轉向」契機

Reflecting the Methodological Predicaments in Political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st-Positivism and Discourse Language

doi:10.30390/ISC.201712\_56(4).0004

問題與研究, 56(4), 2017

Issues & Studies, 56(4), 2017

作者/Author：徐振國(Chen-Kuo Hsu)

頁數/Page：87-10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7/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712\\_56\(4\).0004](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712_56(4).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從索緒爾語言學和維根斯坦後期哲學 看政治學方法論的「轉向」契機

徐 振 國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兼任教授)

### 摘 要

1970 年代前後，西方曾有許多重大的學術知識「轉向」，旨在批判或修改邏輯實證論的基本結構。政治學界沒有抓好這個重要的轉折，故陷入方法論的困境，而無法調節學門內各領域的關連，形成「分桌吃飯」的局面。這個危機在冷戰驟然結束之時爆發，形成國關內部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的大論戰，其後又形成 2001 年美國「政治學的改造運動」。然而，都未能有效地化解政治學內部長年積壓的矛盾。本文認為，索緒爾開啟的現代語言學概念，以及維根斯坦科學哲學後期的逆轉，共同奠定了一道更寬廣的轉向路徑，有助於政治科學擺脫困境、變得更完整周全。

**關鍵詞：**知識「轉向」、方法論困境、大論戰、改造運動、周全科學的政治學

\* \* \*

### 壹、前 言

1970 年代前後，西方曾有許多重大的學術知識「轉向」，旨在批判或修改邏輯實證論的基本結構。政治學界沒有抓好這個重要的轉折，故陷入方法論的困境，而無法調節學門內各領域的關連，形成「分桌吃飯」的局面。這個危機在冷戰驟然結束之時爆發，形成國關內部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的大論戰，其後又形成 2001 年美國「政治學的改造運動」。然而，都未能有效地化解政治學內部長年積壓的矛盾。本文認為，索緒爾開啟的現代語言學概念，以及維根斯坦科學哲學前後期的逆轉，共同奠定了一道更寬廣的轉向路徑，有助於政治科學擺脫困境、變得更完整周全。

## 貳、困境形成

1970年代前後，西方學術界發生了各種類型的學術知識轉向，包括「詮釋轉向」、「語言學轉向」、「修辭轉向」、「敘事轉向」、「歷史性轉向」、「隱喻轉向」、「論證轉向」、「文化轉向」、或「實踐轉向」等等。<sup>①</sup>總體而言，這些轉向是針對1930年代盛行的實證主義主流科學觀的逆轉，有共通的趨勢，也有各別學派不同的偏重。

原來，後行為主義政治學也是「後」學的一支，對行為主義政治學進行「革命」。然而，後行為主義當分辨不出當時諸多轉向的利弊得失，也無法有效提升原行為主義政治學中的科學特性。因此，它很容易陷入到一種前後接不上頭的困境。其實，行為主義政治學也曾是一支激情的學術隊伍，參與邏輯實證論所倡導的科學哲學革命浪潮，對傳統政治學進行「革命」，宣布「制度的終結」、「法律的終結」、「歷史的終結」、「思想的終結」，「意識形態的終結」，幾乎要剝奪掉傳統政治學的所有的基本特徵，試圖開展一種貨真價實的實證科學政治學。

唯行為主義盛行的時間不到二十年，後行為主義竟然在學運和學術轉向的雙重壓力下，指謫行為主義政治學稟持自然科學相同的方法研究政治現象不切實際，其「價值中立」的主張尤其使政治學無法探討實際政策議題。然而，後行為主義又無法規避美國自實用主義以來長期開創的民主科學觀，故在激烈批判的背後，實呈現了一種停滯迷離的狀態。就在此時，理性主義政治學發揮了乾坤一決的作用。按學理傳承而言，理性抉擇政治學沿襲了理性抉擇經濟學的路徑，肯定民主憲政體制提供的個人自由抉擇空間，由此採納了個體經濟學理性人的假設前提，然後在博弈理論的數理推論模式上，可以滿足實證科學演繹邏輯的特性，甚至認為可以達到律則涵蓋解釋或預測的效果。如此，理性抉擇政治學便能同時滿足了美國內建的「民主」和「科學」要求，而讓實證政治科學得以延續。基於此，理性抉擇政治學的創始人 William Riker 很喜歡用一個比喻，認為實證政治科學是一條既將沈沒的破船，理性抉擇是當時唯一能把政治學帶進安全港的一條拖船。

另一方面，行為主義政治學也留下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其中以實證經驗研究最為亮眼，善用統計調查方法進行選舉和民意等課題的探討。然而就方法論的特性而言，理性抉擇和實證經驗研究各有偏重。理性抉擇強調演繹邏輯，以個體經濟理性人為基本假定在博弈理論的基礎上進行複雜的數理推論，久而久之和實際政治脫節，而無法滿足邏輯實證論中的「實證」要求。相對而言，實證經驗研究強調歸納邏輯，不斷地進行實證經驗研究調查，卻又提升不出有意義的「定律」，故無法滿足實證科學所要求的演繹特性，更遑論達到律則涵蓋解釋或預測的境界。

然而弔詭的是，儘管方法論是政治學研究所必修的入門課程，大部分政治學者卻

註① Dvora Yanow and Schwartz-Shea, eds., *Interpretation and Method: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Interpretative Turn*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2006), p. xi.

不真正在意方法論，也未必能分辨出演繹邏輯和歸納邏輯在使用上的差異與後果。此時，具有決定性的分辨機制反而落在技術性的研究方法層次，「量化與質性」的二分法遂成了區別科學性質與程度的重要判準。基於此，由於理性抉擇和實證經驗研究各擁有自己的數理量化研究途徑，縱使兩者之間很難相容，甚至各有嚴重的缺陷，還是被看做是政治學中最具科學表徵的兩個學術高峰。

至於為數廣大的質性研究領域，皆以語言文本作為研究基礎，然因開發不出共通的方法論基礎和研究途徑，往往只能按研究課題性質區分，而呈現支離分散的狀態。其中最顯著的是傳統制度研究和歷史研究，在行為主義革命時遭到「終結」的貶抑，卻還在政治學的教學範疇不可或缺的一環。至於政治思想，雖然也曾被「終結」，卻能藉「詮釋轉向」的力道而重建立起自己的小山頭。後現代研究也因符合「文化轉向」的趨勢，而擁有自己的灘頭堡。區域研究往往按地域的劃分而僅能保有零散的地盤。新興的專業領域，如國際政治經濟、政治經濟、政治社會、新國家理論、女性主義政治學等等只能靠個別學者單打獨鬥。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公共政策，原來是後行為主義的主打牌，卻和主流政治學疏離，而和公共行政合流。公共行政則早和政治學貌合神離，要求另立門戶。凡此，都印證了美國元老政治學家所說「分桌吃飯」的格局，潛藏了內在的方法論分裂危機。嚴肅地說，政治學號稱是一個「學門」、卻無法有效地建構其內在的學術主體性和統一性。

## 參、危機爆發

政治學分裂的危機終於在 1989 年爆發。國關政治學界對於東歐崩潰蘇聯瓦解這等大事，既不能於事先提出預測，又不能於事後提出解釋，徒讓福山夾黑格爾哲學提出《歷史的終結》的說法而獨領風騷。必須指出的是，福山提出的其實是一種詮釋性解釋（interpretative explanation），並非邏輯實證論所標榜的科學解釋（scientific explanation）。按國關政治學一向重視現實主義理論，強調權力政治。Kenneth Waltz 曾成功地將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和實證科學方法論做了結合，甚至也大量採用理性抉擇的分析方法，對於核武戰爭和國際經貿談做了很多博弈理論的推演，卻未能充分意識到共產世界的意識形態的萎縮與後果。對此，Alexander Wendt 早在寫博士論文便對 Waltz 的方法論立場提出批判。蘇東坡事件後，遂在國關學界釀成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的大論戰。Wendt 採納了科學現實主義的立場，希望超越實證論和詮釋學，而有更多本體論和認識論的自覺來看待國際政治問題。不過，長年的爭議，建構主義固然獲得普遍的認識，許多國關學者卻也擔心，增加太多哲學思考的負荷而變得力不從心，甚至可能再度扭曲國關的主體關懷。<sup>②</sup>

註② 值得注意的是，Wendt 和改造運動的主要理論家 Ian Shapiro 共同推動科學現實主義，他們早在 1992 年合寫一篇“The Difference that Realism Makes: Social Sci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Consent”見 *Politics & Society*, Vol. 20 No. 2, pp. 197~223，是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

政治學方法論的危機爆發是 2001 年美國政治學年會時發生的「政治學改造運動」(perestroika movement in political science)。此事始於 2000 年底，一份匿稱「改造先生」網路郵件，指摘美國政治學會 (APSA) 及其隸屬刊物美國政治學報 (APSR) 被「一小圈」偏重統計和博弈理論的學者把持，長期誤導政治學的發展方向，而使其他各類研究領域只能曲居在地區性或個別專業性的刊物之中。匿名函也提到美國政治學界在蘇東波事件中應對失能。不過事後有人指出，匿名函作者受到最直接的刺激，是看到英國牛津大學經濟系研究生對主流經濟學的批判，指出過度傾向數理經濟，而失掉了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能力。此外，批判者還指出理性抉擇搞出一套「務虛經濟學」，故特別豎立了「後務虛經濟學」(post-Autistic Economics) 網站 (www.paccon.net)，希望能盡快超越此一為時久矣的磨難。總之，匿名信以及其他相關訊息造成了薪火燎原之勢，終於引發了 2001 政治學年會時的類政變行動。當時為數甚多的改造運動者以相當隱密的方式集結，然後提出要求美國政治學會進行改革的訴求。在正當程序下，政治學會對於這樣一種來路不明的要求可以置之不理。然因反對的勢力很大，觸及的糾結很深，故美國政治學會採取了妥協的態度，選出了改造運動者所屬意的學會主席，同時在學會下新設一個偏重質性研究的學刊 *Perspectives*，另也出版專刊抒解各方爭議。

然而可惜的是，在方法論實質課題的檢討方面並無高論。其中最值得重視的部分是，Ian Shapiro 為「理論負載」(theory laden) 和「問題驅策」(problem driven) 和論友之間的往還爭議。Shapiro 承認，研究者都會採用某種理論依據。然而理性抉擇的弊病是，過度地採用了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前提和微觀博弈理論的套式，而看不到宏觀脈絡，故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遮蔽了問題，甚至剝奪了問題的政治屬性。除此之外，改造運動並無太多新意，例如強化問題驅策的研究，超越量化的研究途徑，以及提倡跨界研究等等，都是在重複後行為主義革命時期的課題。Gregory Kasza 號召「要追求一個周全科學的政治學」(For an Ecumenical Science of Politics)，卻看不到落實的基礎。<sup>③</sup>

筆者認為，政治學的基本問題是在 1970 年代紛雜龐大的知識「轉向」中的迷失了。政治學界也有人曾試圖去選擇其中最佳的路徑，但總是流於枝節，抓不到要領。現為正本清源，本文下面兩節將分別討論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 在語言學概念上的啟迪，以及維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 後期科學哲學觀轉向的意義，期能從此找到政治學重建的引導。

## 肆、索緒爾語言概念的啟示

索緒爾開啓現代語言學，對於實證主義語言學的概念產生了很大的補充和修正。

註③ Gregory Kasza 可以說是改造運動中的一位鑼鼓手，很有叫戰功力，代表文宣為“Perestroika: For an Ecumenical Science of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34, pp. 597-599.

不過，在這之前，我們先要提兩個西方語言學的傳承。其一是亞里斯多德開啓修辭學傳統。修辭學講究演講辯論，背後卻有溝通互動的詮釋學方法論根基，要在能掌握一個共同的脈絡情境，而達到呼應導引的效果。古典修辭學推陳出新，依然是當代語言學中重要的一支。另要特別注意的是，亞里思多德也同時是「定言三段論法」的開創者，至今仍是演繹邏輯中的重要組成，在邏輯實證論中衍生成「演繹性律則涵蓋解釋模型」。按邏輯教材中最著名的範例是：「凡人皆有死，蘇格拉底是人，故蘇格拉底會死」。律則涵蓋解釋模型中政治學的典例則是：「凡採單一選區就會有兩黨制，英國採單一選區制，故英國有兩黨制」。現在需要檢討的是，亞里思多德被奉為政治科學的始祖，亞氏把語言和形式邏輯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為什麼現代實證政治科學強調形式邏輯和量化的地位，卻貶抑了語言的重要性？

西方另一重要傳承是，語言學一直有崇高的學術知識地位。至十七、八世紀現代自然科學出現之前，語言學家一直是最受尊崇的學者，特別是能通達拉丁文、希臘文、巴里文、梵文等古語者，尤其被認為是博學廣聞之士。他們早就從語音和語法的組成上看到印歐語系的共通特性，而將之做一統稱。總之，傳統語言學枝葉繁茂，在學院中有重要地位。索緒爾便是在這樣的學院環境中孕育出來的語言學家。那麼，索緒爾新創的現代語言學和和之前的傳統語言學有何根本差異？中國大陸專攻索緒爾的語言學家裴林指出三個重要的區別：

第一、共時性與歷時性：現代語言學把語言當作某一特定時間內一個自足的交際系統；傳統語言學集中研究語言在較長歷史中所經歷的變化。

第二、語言和言語（話語）：現代語言學重視從一代人傳到另一代人的語言系統，是相對穩定的本質部份，是語言集團的總模式，它包括語法、句法和詞匯（\*臺灣一般都說「詞彙」，大陸則說「詞匯」）；傳統語言學重視語言的投射和體現，是在某種情況下個人的說話，即說話者可能說或可能理解的全部內容。換言之、語言體系是一個由形式構成的系統；而言語是實際的講話，是依賴于語言系統的一種行為。<sup>④</sup>

第三、從共時性的角度：必須把任何一種語言都看成是一個由互相關連的詞匯、語法、和語音等成份構成的系統。在此系統中，索緒爾發現兩個最基本的語言關係。一種是意識到二項對立，這種關係產生互有區別又可以彼此交替的形式，比如，濁音與清音相對（如 b 與 p），單數與複數相對（如 woman 與 women）。這種關係自然而經濟地反映語言自身的性質。另一種則是構成語符列的單位之間的關係，即橫向組合與關聯組合。橫向組合關係確定橫向組合的可能性，即可能組成一個語符列的那些成份之間的關係。關聯

---

註④ *Ibid.*

組合則是在一個結構中佔據某個相同位置的形式之間的聯合關係，即能夠互相替換的成份之間的對立。<sup>⑤</sup>

簡言之，傳統語言學重視歷時性語言，以及日常的言語或話語。現代語言學開發了共時性語言學的研究領域，著重語言體系的結構，注意語法、語音、語匯等等的構成系統。不過，裴林指出，現代語言學並沒有輕忽傳統語言學，而強調歷時性語言和共時性語言學各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和原則，都是完整的語言學研究所不可少的課題。<sup>⑥</sup>

此處，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索緒爾從現代語言學的角度固然發現了語言學諸多內在元素的形式結構，卻還是肯定日常語言的基礎地位。他刻意在日常語言中區別出「所指」(the signified)和「能指」(the signifier)兩個範疇。「所指」是指名目概念或形式結構，「能指」則是指具體的音響形象等實質內容，兩者可以合稱之為「符號」(sign)。「所指」和「能指」之間有可能的對應關係、但也可能互不相干。

索緒爾對語言基本性質的界定，可以顯示邏輯實證論在語言概念認知上的侷限。後者在界定「科學概念」時，也是「從語言的脈絡」著手。然而他的排他性很強，刻意地擺脫日常語言的常識性概念，也排除哲學思考的「真實定義」(real definition)，認為柏拉圖在《共和國》中以思辨方式界定「正義」的本質，容易捲入永無止境的爭辯。為了避免日常語言的紛亂以及哲學語言的繁瑣，實證科學強調「名目定義」(nominal definition)方式來界定概念，也就是掌握到某些具體特徵後，便賦予該項概念的一種名目。行為主義政治學中最喜歡舉的例子便是 Robrt Dhal 對「權力」的定義：「A 讓 B 做 B 不願意做的事情，A 就是對 B 有權力」。此一定義方式符合實證原則，或更確實地說符合操作性定義的原則，就是藉一種可檢驗的程序來達到概念界定之目的。

現若依照索緒爾的思維，可能不反對 Dhal 按其自身研究的需要來界定權力，這也就是一種「所指」。然而索緒爾會提醒 Dhal，還得以更靈活的態度看待研究所需的專業概念和日常語言中所指涉的權力現象之間複雜的關連。專業概念固然可以實證原則或操作性程序來界定概念，日常生活中的語言所產生的概念也有其社會廣泛的約定成俗基礎。當然，哲學家們也有權利按照他們自己的方式來釐清語詞或界定概念。還有，言語本身也是會變化的。以 Dhal 辛苦界定出權力概念來說，後來也在學界有更深切的認知後，便會衍生出更寬闊的意思，例如 A 掌握了議程，就讓 B 失掉了對等的地位。至於 A 根本不讓 B 進入議場，A 的權力當然就更高一籌。凡此，研究者如能善加利用「所指」和「能指」之間的龐大灰色地帶，應該就能更靈活而有效的來調度和使用概念。另外，我們還要特別注意的是，政治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專業概念和日常用語至今還是混雜在一起，無法像自然科學那樣，建立起自己的專業語言體系。或者，往更深處說，政治學和人文社會科學要處理人在社會中的意向和共識問題，是否有必要擺脫

註⑤ 裴林在南京大學語言學任教，翻譯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第五版)，出版《索緒爾：本真狀態及其張力》(2003年)，並在南大創索緒爾研究中心。

註⑥ *Ibid.*, 2003, p. 82.

日常語言而另建專業語言是一更根本的問題。凡此，都該參考索緒爾的觀點，看到日常語言和專業語言之間獨立而複雜的互動關係。

另就邏輯的特性而言，前面提到索緒爾語言學中有「二項對立」的分辨，後來衍生成更深層的「二元模式」(the binary mode)。按「所指」和「能指」之間固然是一種對立的二元。被指涉或界定出來的「個體」及其所隸屬的「整體」之間也是一種對立的二元。一項文本之中的句段(syntagm)和語群(paradigm)之間也是一種對立的二元，兩者集結的章篇及其所屬的整體文本之間同樣是一種對立的二元。此一二元模式所蘊含的邏輯關係超越了實證科學所偏重的歸納法和演繹法，而進入到辯證法的領域。而此種辯證法未必要符合黑格爾式的「正、反、合」模式，卻可能更契合當代現象學 Robert Sokolowski 所說「在場和缺場」(presence and absence)、「整體和局部」(parts and wholes)、和「同一和多重」(identity and manifold)等三種基本形式結構。<sup>①</sup>這對偏執於歸納邏輯和演繹邏輯的實證主義者、習於命題式的表達、而又無從化解理性抉擇和經驗研究各據一方的困境，索緒爾語言學中蘊含的辯證邏輯應該能發揮調和鼎鼐的作用。

## 伍、維根斯坦後期科學哲學觀的轉向

文章開頭處提到，1970年代前後有諸多「轉向」，卻獨漏了最核心而且最重要的後實證主義轉向。此一轉向的關鍵人物是維根斯坦，他的哲學可以分成前期和後期兩個階段。維氏前期哲學，可以維氏1914年出版《邏輯哲學論》(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為代表，崇尚理性和科學思維，和邏輯實證論的發展有密切關聯，是邏輯實證論的主要啓動者之一。維氏後期哲學可以1958年出版《哲學調查》(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為代表，和邏輯實證論分道揚鑣，對於科學觀產生了新的見解。在西方哲學界，維氏和「維也納學圈」之間的糾葛是一段重大公案。早期，論者認為維根斯坦自己發生了思想突變，羅素甚至認為維氏從一個哲學天才變成了一個頭腦不清楚的庸才。唯自1990年代中葉之後，青壯哲學家重新研究和評估了維氏後期哲學，認為維氏其實是以不同的角度和深度來看待科學。他們甚至發現，維氏和維也納學圈之間原來就存在著一些重要分歧，維氏後期哲學其實是從這些原始差異中逐漸蛻變而來，不是一種突變。國內科學哲學專家苑舉正教授指出，維氏前後期科學哲學觀點的轉變大約包含了三個相關聯的方向：

其一、維氏前期試圖採用一種明確的理論、清晰的語言、以及切合於實證原則的命題方式來界定科學的範圍。維氏後期就放棄了這種為科學設定範圍的努力。

註① 見李維倫譯，現象學十四講，頁45。

其二、維氏前期重視理論語言，後期則回到日常語言，試圖在那種具體、複雜、多面以及不確定的狀態中找到一些可以化解混淆的途徑。

其三、維根斯坦前期採取一元立場，認為只有在嚴謹的自然科學命題中，可以建立唯一正確而嚴格的方法。維根斯坦後期則主張要還原語言的複雜現象，要掌握語言遊戲中說法的相似性和差異性來呈現語言中的事實。<sup>⑧</sup>

維氏甚至認為「我們不應發展任何理論」，「我們無須任何解釋，因為僅憑敘事即可取代它的地位」。<sup>⑨</sup>晚近的科學哲學家還確認維氏後期哲學直接影響了孔恩（T. Kuhn）、漢森（N. Hanson）和費耶阿本（P. Feyerabend）等三位重量級的後實證論者。這裡我們要特別談一下孔恩，他是從科學史來瞭解個別重大科學發明之間的關連，完成了他那部赫赫有名的大作《科學革命的結構》。此處要特別檢討的是，政治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皆好採用孔恩說法，認為自己也已歷過「典範轉移」而進入到「常態科學」的堂奧。針對此一龐大的攀附現象，有哲學家譏諷孔恩，認為他寫了一本八面玲瓏的書可以討好各方。孔恩也深感困惑，自己明明探討的是自然科學的現象，為什麼會召引人文社會科學各界來援引他的看法。為了要為自己的科學哲學立場定調，孔恩也就認真地採納了維氏後期的科學哲學觀。

筆者認為，孔恩的識見被廣用或被濫用的問題必須從兩個角度來看。首先，孔恩把自然科學的發展做了整體的呈現，有其起承轉合過程、甚至有其革命創新的蛻變。這其實是各類學科知識變化常有的現象，學者們借孔恩之說來做類比運用，倒也相當自然。不過，縱使如此，政治學和人文社會科學也還是有張冠李戴、暗渡陳倉的嫌疑。須知，孔恩說的「典範」，有其複雜的摸索過程以及嚴格的自身檢驗門檻。以牛頓的自由落體定律為例，是天文學家加里略確認地球是一顆懸掛在浩瀚無垠宇宙圍著太陽轉的球體，因此才會產生蘋果為什麼會從樹上掉下來而不是飛出去的懸疑。這個問題此後成物理學界一個惱人的公案，經歷兩百年來的探索，牛頓終於提出了各方接受的解方，自得圓滿，不假外求，故為自然科學界第一個成功的典範。政治科學和其他人文社會科學並無這種科學性質的典範，故也就不必以「典範移轉」來自我標榜，更不必不以「常態科學」自居。往淺處說，政治學方法論學者 Isaak 指出，政治學甚至沒有「理論概念」，也就是不必用實體或程序來實證、而僅在理論脈絡中推論而得的概念，因此也就沒有嚴格意義的科學理論，甚至也沒有嚴格意義的科學模型。<sup>⑩</sup>此外，政治學甚至未能超越日常語言脈絡而建立起自己的學科專業語言體系。那麼，政治學為什麼要困守在重重框架而又無法超越的實證主義思維中？為什麼不進入後實證主義的範疇並利用日常語言的寬廣特性、來找到一條切合自己學科性格的發展之路呢？

註⑧ 苑舉正，「維根斯坦哲學對後實證科學哲學」，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45卷（2004年），頁440~442。

註⑨ 同前註。

註⑩ Alan Isaak,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thodology of Political Inquiry*，第五章，討論科學理論和模型的部分。

此處，我們還要把維氏思想轉折的時間略作釐清，藉此看到他和政治學發展的可能關連。在 1920 年代維氏和邏輯實證論學派過從甚密，然後逐漸產生間隙。大約在 1930 年代使用維也納方言完成他後期哲學觀點的代表作《哲學調查》。維氏 1951 年過世，1958 他的學生將其奧地利方言著作翻譯成英文版本，而正逢西方學運和新知識轉向的開始。西方堅守實證主義的學者固然對他存疑，反實證主義者或試圖另闢蹊徑的學者開始重視他的新作、包括寫科學典範轉移的孔恩。基於維氏新作受到褒貶不一的看待，少壯哲學家才會用心去檢視他思想轉變的特性，而使他的思想從 1990 年代產生了非常普及的影響。在這整個過程中，國人對維氏的思想的轉折有一些片斷的介紹。至 2004 年苑舉正才做出深度的介紹，筆者更要遲至 2013 年才初步摸索這個課題。此處要特別指出的是，政治學界若能及早注意維根斯坦科學哲學觀轉向的意義和影響，也就會有足夠的資源來預防和疏導改造運動的紛爭。

另就實質內涵來說，當維氏從偏重嚴謹的理論語言移轉到偏重一般語言，或從偏重命題式的通則檢驗、回歸到偏重整體情境脈絡的探索，維根斯坦便和半個世紀前的索緒爾有了銜接，便將現在語言學和後實證主義做了很重要的連接。這兩個重要的學脈對人們表意的語言以及人們所要研究的科學項目之間，各有偏重地做了深刻的探討、同時又將兩者的依附承載關係做了認真的釐清。此外，在肯定整體脈絡而又重視不同視角的前提下，後實證主義和詮釋學現象學也產生了可以相容的溝通互動，從而可能實踐「詮釋科學」(interpretative science) 的理念。<sup>①</sup>總而言之，索緒爾開啓的現代語言學和維根斯坦開啓的後實證主義共同奠定了一個更深刻的轉向基礎，可以讓政治科學和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找到更切合自己學科性格的發展路徑。

## 陸、餘 論

1970 年代前，西方國家展開許多類型學術轉向，旨在對邏輯實證論進行批判和修正。後行為主義政治學原來也是其中的一支，對實證主義政治科學展開「革命」，指謫它和現實政治脫節，強調重視公共政策。然而，後行為主義倡導者依然受制於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觀，故在經濟學理性抉擇的誘導之下，實證主義再度處於主導地位。在此一轉折過程中，政治學者未能對方法論做出深刻的檢討，反而讓量化和質性的技術性二分法成了科學性質和科學程度的判準。基於此，理性抉擇因善用博弈理論、實證經驗研究因善用統計調查，遂成為政治學中兩個最具科學樣貌的代表。其他廣大的學科領域都以小山頭或散漫的方式分布。Almond 稱此為「分桌吃飯」，其實隱藏了政治學門整體性和主體性皆有不足的內在危機。

此一危機終於在冷戰驟然結束時爆發，在國關學界引發了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的大辯論。其後，2001 年美國政治學會產生了類似改變的「政治學改造運動」。但都沒

註① 「詮釋科學」的概念出自 Rabinow, Paul and William M. Sullivan, 是他們 1979 年合編的一本書的書名: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有解決政治學長期積壓的內在矛盾。面對此一重大困境，本人認為要拉長視野的縱深，特別借重現代語言學開創者索緒爾的學語言概念，以及後實證主義開創者維根斯坦的後期科學哲學觀，從四個方面來檢視政治學方法論的根本問題。

第一、關於語言：政治科學不能太執著以「名目定義」的方式來界定科學概念，因而遮蔽了語言的廣泛用途。索緒爾和維根斯坦都不約而同地強調日常語言的重要性，確為它是一種可以包羅人們豐富的意向和感情而又可以藉之創造共識並相互溝通的母體。此處要特別注意的是，政治學一直未能界定出自己學科的專屬概念，像化學用  $H_2O$  界定水那樣，而必須依附在日常政治語言之中，故特別需要瞭解日常政治語言的運作機制和變化趨勢。此外，縱使自然科學已經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專業語言，然而為了科際之間的溝通，更為科學普及的需要，也必須善用日常語言來融入人們共通的社會意識基礎和溝通管道。

第二、關於邏輯：實證經驗調查偏重歸納法，理性抉擇偏重演繹法，各在其框架中發揮功能，卻不容易溝通互動。索緒爾則早在日常語詞的界定中就看到了方便之門。他指出日常語言中「名」「實」之間的靈活分際，而刻意區別出「所指」和「能指」兩個範疇。前者指名目概念與形式結構，後者指具體的音響形象等實質內容。兩者之間可能有呼應關係，也各有獨立的變通法則。政治學為符合科學的特性，強調「所指」的部分，忽略「能指」的部分，是一重大的病根。實證主義者背後還有一種信念，相信有一客觀實存的世界，故概念的界定或通則的建構，都要經得起實證的考驗，旨在找客觀實存的「定律」(law)。有了定律，才能進行律則涵蓋性的解釋或預測。相對於此，索緒爾等現在語言學家則傾向後實證主義的思維，認為日常語言由社會約定成俗而成，原來就有「相互主觀」的屬性，故偏重語言使用者的內在「規則」(rule)，可以藉此瞭解人們的言談舉止與論述內涵。換言之，語言學家固然可以從語音學、語法學、語用學、符號學等專業範疇中尋找通則或定律，語言學家也同時需要從日常語言中如其然而地探索人們明訂的或潛藏的規則。若此，政治科學到底是在進行定律的驗證或規則的探索，這當中有重大的分際，必須要有一明辨和區分。

第三、關於實證的範圍：實證主義偏重定律的證成和運用。如前所述，實證主義是以「歸納法」來證成定律，然後用「演繹法」來發揮定律涵蓋性的解釋和預測效果。一般而言，定律證成和定律運用之間，原來可以相互為用和相互修正，而有辯證互動的關連。然而，實證科學方法論的教材中並沒有提過辯證法的性質和功能。而在實際狀況中，尤其呈現了嚴重的偏頗。理性抉擇政治學偏重演繹邏輯，實證經驗研究偏重歸納邏輯，各有擅場，很難互動。相對於此，後實證主義採取了一種比較寬容的立場，不把重點放在定律的證成、而放在理論脈絡的整體呈現，甚至因此肯定論述的價值，就是把事理的脈絡說清楚便能達到解釋的效果，而不必太過強調採取形式要件的實證。這種寬容的態度對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特別有利。例如歷史學家黃一農院士，物理學出身，便是以中國古籍中的天文資料來說明現代天文學中所關心的星體變化。此外，他又以四億多字的滿漢文檔資料來深入研討明清時代的教案、科技發展的狀態，以及國防軍事的佈局。他也以同樣的資料，來釐清紅樓夢研究中的諸多疑點，

而提出「新紅學」與「新考證」的主張。總之，黃一農不是借重實證、而是借重細緻的描述和闡釋來達到呈現人情事理的目的。<sup>12</sup>

第四、關於理論落實的基礎：必須強調的是，後實證主義和現代語言學並不是一種停留在純理論層次的學說，各自都有寬廣的落實基礎和管道。後實證主義加速了知識社會學、科學普及（科普）、和科技社會學（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等學科的發展，已蔚然成林，集結成一片片嶄新的學科領域。索緒爾開創現代語言學，強調日常語言。不過，受其開導而崛起的各重大語言學學派也都是以語音、語法、語彙、語意、符號等領域來做專業研究，不敢貿然進入龐雜的日常語言世界。這要到1980年代中期之後，論述語言學興起之時才發揮了整合的功能，超越了現代語言學的專業範疇，對日常語言進行全面而深入的認識。此一「轉向」對大眾傳播、社會學、人類學、和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皆有重大影響，而原該有修辭學傳統的政治科學卻無動於衷。這也就是造成政治科學迷失的另一項重要根源。此外，更重要的是，傳統語言學和電腦語言學自1960年代開始銜接，將原來由人工製作、也就是以字斟句酌的方式進行的「詞性標記」，改由電腦來執行。此可以更快速有效地隨各類日常語彙的變化而掌握到日常語言中字詞語法屬性，由此就產生了新興的語料庫語言學或計算語言學。謝清俊教授便是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中研院語料庫（Sinica corpus）<sup>13</sup>。我們每人每日使用電腦和手機篩選中文字詞時，便運用了該語料庫的功能。此一學科現在已經成為AI人工智慧發展中重要的一環，旨在能對人類各種自然語言進行即席翻譯，達到全人類無障礙的溝通效果。基於此，本人認為，現在語言學衍生而成的論述語言學兼具了實證主義和後實證主義的特性，遠較「科學之后」的經濟學更周全，值得政治學重建之時的參考。

上述四項基本問題，礙於篇幅，本文討論了前三項，將來若有機會時再彌補第四項。至於美國政治學為何會那麼強調「民主」和「科學」而造成一種學術上的畫地自限，那得回到杜威主導的實用主義來做檢討，也得另覓機會來談。

\* \* \*

（收件：106年10月6日，接受：106年10月26日）

註<sup>12</sup> 見黃一農兩冊由清華大學出版的代表著，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2014年）：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2015年）。

註<sup>13</sup> 本人曾邀統計專家洪永泰教授利用此一語料庫進行一項「文本內容分析」的研究，並不十分成功，但對語料庫的功能和計算語言學的性質略有瞭解，對本人後來在方法論研究方向上產生很大的影響。

# Reflecting the Methodological Predicaments in Political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st-Positivism and Discourse Language

*Chen-Kuo Hsu*

Adjunc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language concepts defined by Ferdinand De Saussure and the late philosophy created by Ludwig Wittgenstei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point out a possible “turn” that may render the study of politics “an ecumenical science of politics” upheld by Gregory Kasza in the Perestroika movement of the discipline in 2001.

**Keywords:** Intellectual Turns, Perestroika Movement, Language Concepts, Post-empiricism, an Ecumenical Science of Politics

## 參考文獻

- Sokolowski, Robert (索柯羅斯基·羅伯), *現象學十四講*, 李維倫譯 (臺北: 時報, 2004年)。
- 苑舉正, 「維根斯坦哲學對後實證科學哲學」,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45卷 (2004年), 頁427~454。
- 洪永泰、徐振國, 「從『論述分析』到『文本內容分析』: 政治文本中語碼和數碼的雙重奏」, 《且讓河水犯井水: 政治學方法論的檢討》研討會, 2005年5月14-15日在中國文化大學和平東路城區部舉辦。
- 徐振國, 「試探黃一農以大數據考證《紅樓夢》的研究方法」, 韓中FTA和語言文化交流的展望, 韓國中國語言文化研究會、首爾孔子學院、東國大學慶州分校主辦, 2016年。
- 徐振國, 「內容及文本內容分析」, *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質性研究法 (二版)*, 瞿海源等人編著 (臺北: 東華書局, 2015年), 第9章。
- 徐振國, 「政治學改造運動的爭議和啟發: 從『通則』到『脈絡』的轉向」,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第45期 (2013年), 頁1~61。
- 徐振國, 「從維根斯坦前後期哲學的轉變探討政治科學的『轉向』問題」, 2012中國政治學會年會《劇變中的危機與轉機: 全球治理的發展與困境》學術研討會, 2012年。
- 徐振國, 「在美國政治學『改造運動』脈絡中檢討 Isaak 的方法論觀點: 自然科學方法論中隱含的詮釋學需求」, 黃瑞祺、羅小南主編, *人文社會科學的邏輯* (臺北: 松慧文化, 2005年), 頁385~418。
- 黃一農, *二重奏: 紅學與清史的對話* (新竹: 國立清華大學出版, 2014年)。
- 黃一農, *兩頭蛇: 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 (新竹: 國立清華大學出版, 2015年)。
- 裴林, *索緒爾: 本真狀態及其張力*, 南大創索緒爾研究中心, 2003年。
- Almond, Gabriel, *A Discipline Divided: Schools and Sects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bury Park, CA: Sage, 1990).
- Fukuyama, Francis, "How Academia Failed the Nation: The Declining Regional Studies," <http://www.saisjhu.edu/pubaffairs/publications/saisphere/winter04/Fukuyama.html>. 2005.
- Green, Donald P. and Ian Shapiro, *Pathologi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 Critique of Applica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Isaac, Alan C.,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thodology of Political Inquiry* (Homewood, IL: International Thomson Publishing (1997)/The Dorsey Press, 1997/1985/1969).
- Hacker, P. M.S., "Wittgenstein's Place in Twentieth-Century," *Analytic Philosophy* (Oxford: Blackwell, 1996).

Kasza, Gregory J., "Perestroika: For an Ecumenical Science of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34, pp. 597~599.

McGinn, M., *Wittgenstein and the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 London: Routledge, 1997 ).

Riker, H. W., "Political Science and Rational Choice" in James E. Alt and Kenneth A. Shepsle ed.,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pp. 163~181.

Shapiro, Ian and Alexander Wendt, "The Difference that Realism Makes: Social Sci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Consent," *Politics & Society*, Vol. 20 No. 2, pp. 197~223.

Shapiro, I., "Problems, Methods, and Theorie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 or What's Wrong with Political Scienc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Political Theory*, Vol. 30 No. 4 ( August 2002 ), pp. 596~619.

Shapiro, Ian, Rogers M. Smith, Tarek E. Masoud, *Problem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